

# 匪俄鬥爭的新形勢

尹慶耀

## 引言

一九六九年毛共「九大」前後，匪俄之間不僅是箭拔弩張，甚且已砲聲隆隆，但那并非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同年十月以降，雙方開始邊界談判，并且交換了「大使」，簽訂了貿易協定，但那也并非是一場真正的和解。

共黨有自己的一套矛盾哲學、辯證邏輯，毛共更強調「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論的重要性」（註一）。對外活動的實際工作亦復如是。換言之，從共黨對待「敵對矛盾」對象的立場言，「和」「戰」乃是一事的兩面，并非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目前的匪俄關係，表面上是不戰不和，實質上也可說是亦戰亦和。正如同毛澤東所說的：「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註二）。而且，在共黨的詞典裏，和平只是戰爭之另一形態的繼續。毛澤東又曾說過：「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註三）。把軍事衝突看作是戰爭，把政治鬥爭看作是和平，那只是自由世界的觀念，但共黨却并不如此。

研究兩個共產政權間的相互鬥爭，是不能忽視那些共黨本身的觀念的。

## 一 邊界談而不決，軍事備而未戰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毛共偽政權為與蘇俄舉行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發表聲明，抨擊蘇俄在邊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並且露骨地影射毛共「要對蘇聯發動核戰」。接着，毛共聲言自己發展核武器，是爲了防禦，爲了打破核壟斷，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它「也決不會被戰爭威脅，包括核戰爭威脅所嚇倒。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

不韙，襲擊中國（毛共——下同）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

關於邊界談判本身，毛共建議「中蘇雙方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

這些話足可證明，當時外傳蘇俄有意突襲毛共的核子基地，并非完全是空谷來風。毛共是在蘇俄的此項威脅下，爲了和蘇俄達成避免衝突的臨時協議，才答應與蘇俄開始談判的。

匪俄間的邊界談判，從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開始，到現今已一年又四個多月，究竟有些什麼結果呢？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毛共的香港「大公報」透露，談判並不順利，暗責蘇俄依靠「實力地位」，表面和解，實際拖延，利用匪俄談判的名義，追求另外的目的。一九七〇年一月八日該報又透露，蘇俄「拒絕使自己的一切武裝力量在談判期間受到約束，不同意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致使近兩個月的談判毫無結果」。且稱「責在蘇方」。除此之外，毛共避免對談判作直接報導。

在蘇俄方面，據一九七〇年八月十日美聯社新德里電訊稱，印度「愛國日報」刊出蘇俄總理柯錫金對該報主編那拉耶南的談話，柯錫金聲稱蘇俄的一貫立場，是主張與毛共的關係正常化。又說邊界談判正在進行中，現時雙方在邊境未有衝突，但「不能說我們對於中蘇關係的發展感到滿意」。同年十一月六日，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十月革命五十三週年紀念集會中演說稱：蘇共和政府努力促使匪俄的「國家關係」正常化，爲此目的而在北平舉行談判，但那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註四）。

很顯然，北平的邊界談判並不順利。蘇俄首席談判代表外交部第一副部

長庫茨涅佐夫(V. V. Kuznetsov)原是排難解紛的能手，但他已於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稱病返俄，改由蘇俄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I. F. Il'ichev)繼任。伊里切夫是黑魯曉夫時代蘇共中央思想理論委員會主席，黑某垮台後被派往外交部任幾名副部長中之一名，現今他那條冷板櫬被從莫斯科移到北平，就暗示着匪俄邊界談判將變成馬拉松式。

當然，談判還在繼續中，匪俄之間目前似乎不容易爆發一場大戰。

前述柯錫金對印度記者談話時，指責外間流傳着蘇俄準備進攻毛共的說法，是「骯髒的挑釁和徹底的捏造」。同時，即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阿拉木圖市的哈薩克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大會上，竭力否認蘇俄和西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是要騰出手來，在東方對毛共施加壓力。他指責那些是捏造的謠言。又說西方帝國主義集團裏，不少人想使匪俄之間發生衝突，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他抨擊那些人是打錯了算盤(註五)。

目前，由於國內國外的種種因素，使得蘇俄不敢冒然發動戰爭，但正如往昔的宋太祖所說：「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敵人，瞪圓了兩眼站在身旁，蘇俄恐怕也會寢食難安罷？

蘇俄在邊境上部署了大批的機械化與火箭部隊，若干飛彈正瞄準着中國大陸，毛共能不感受威脅？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毛共「兩報一刊」為紀念列寧誕生一百週年發表聯合文章，題為「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文中指責蘇俄以突襲方式佔領捷克，侵犯中國大陸的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等地區，並對毛共進行「核威脅」。認為那「充分暴露了蘇俄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和冒險性。同美帝國主義一樣，蘇俄社會帝國主義的一小撮寡頭已成為準備發動世界戰爭的又一罪魁」。同年毛共「八、一建軍節」時，「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中說：「社會帝國主義正在貪得無厭地窺伺着我國的領土。它一天也沒有放鬆進攻中國的準備。它口頭上說什麼沒有威脅中國，但它為什麼在靠近我國邊界的地區大規模地集結兵力呢？為什麼把它的大批軍隊開進鄰近中國的別的國家呢？為什麼要那樣猖狂地採取軍事部署把進攻矛頭指向我國呢？可見，社會帝國主義同美帝國主義一樣，他們口頭上說什麼不威脅中國，不過是爲了麻痺我們，爲了欺騙它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毛共不相信蘇俄的說法，認爲那是欺騙，於是社論就要求「

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好防禦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對付突然襲擊的一切準備」。同年九月六日毛共九屆二次全會發表公報稱：「全會批准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註六)。備戰工作在進行，其主要的假想敵中，至少有蘇俄在。

匪俄間邊界問題不易解決，但談判尚在進行。軍事衝突危機暫時緩和，但雙方都不放棄備戰。這就是目前的實況。

## 二 原則鬥爭繼續堅持，「國家關係」略見緩和

前引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偽政權的聲明說：「中國政府從不諱言，中蘇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原則分歧，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

在蘇俄，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日即毛共偽慶前夕，「消息報」著論，一方面鼓吹與毛共善鄰、友好，要消除使雙方關係複雜化的因素；一方面宣稱蘇共和蘇俄對於毛共，要堅持其明確的不變的原則性方針。十一月六日即蘇俄十月革命紀念前夕，蘇斯洛夫在前引演說中，一方面聲言蘇共和政府努力促使匪俄「國家關係」正常化；一方面宣稱蘇俄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要「堅持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毛共「決不拿原則作交易」，蘇俄堅拒在意識形態上和旁人「和平共處」。雙方所圖，只是在政治方面改善「國家」關係，這一點倒是彼此一致的。

蘇共視毛共背叛馬列主義，毛共稱蘇共爲現代修正主義，更進而斥之爲社會帝國主義。這是「敵我矛盾」，不容妥協的。

蘇俄對於毛共黨章、革委會、整黨建黨、備戰計劃以及工農、幹部、青年政策等等，無不予以不斷抨擊。毛共偽憲法修正草案經我公布後，蘇俄刻正反覆斥責毛共踐踏憲法(註七)。

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三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蘇聯現代修正主

義的總破產」，指蘇修叛徒集團早已墮落成爲「社會帝國主義」之後，毛共批判蘇俄約有十三論（註八）。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兩報一刊」的「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一文，似乎是對蘇俄抨擊的一次總結。此後，就只簡單而直捷地指責蘇俄爲社會帝國主義。在很多場合，毛共只罵社會帝國主義却不把蘇修連在一起，那并不表示雙方黨的關係緩和，因爲現今除了蘇修之外，沒有那個够資格稱爲社會帝國主義。而且，加不加蘇修字樣，要因時因地看對象而異，或者自己不講，讓蘇修字樣從旁人口裏迸出，其效果仍然是一樣的。

例如：毛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是黨的正式文件，其中就有「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爲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字樣。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六週年紀念時，毛共參加紀念行列的人員，大多只講帝、修、反或社會帝國主義。但廿七日阿「大使」羅博在北平羣衆大會上講話中，就有「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兩個超級大國」（註九）等詞句。廿九日晚，羅博舉行招待酒會，席間又抨擊「以蘇修爲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註一〇），致使捷、匈、東德、波、僞蒙等的外交團憤然離席（蘇俄外交人員未參加）。廿八日晚，阿京地拉那的慶祝集會中，阿內政部長哈茲比烏抨擊：「美帝和蘇修已經結成了緊密的反革命同盟，它們的侵略政策和行徑造成了嚴重的、充滿危險的局勢」。他甚至直稱「蘇修帝國主義」，把「社會」（註一一）二字也省略了去。

右述種種，都出現在毛共的報章上，那和它自己出面咒罵又相差幾許？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毛共電賀蘇俄十月革命紀念，除去上款：莫斯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聯部長會議，和下款：僞「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僞政權的「國務院」之外，在三〇七個漢字（含標點）的電文中，却有五個「十月革命」。要知道，早在一九六七年蘇俄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時，毛共就正式公開指責蘇共背叛了十月革命，不配紀念十月革命。一九七〇年四月毛共在紀念列寧誕生百週年紀念論文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它認爲「蘇修叛徒集團恰恰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背叛了列寧主義，背叛了十月革命」（註一二）。文中還引述毛澤東的話，說列寧和史達林是

兩把「刀子」，但蘇共都丟掉了。在上述的賀電中，毛共說：「十月革命開創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時代。中國人民一向敬佩和支持蘇聯人民爲奪取十月革命勝利和保衛十月革命成果而進行的英勇不屈的鬥爭。中國人民堅信，受過列寧和史達林教育的蘇聯人民，一定能够繼承和發揚十月革命的光榮傳統，爭取新的勝利」。

把右引文章前後對照來讀，不難發現文章之中還大有文章！足可證明匪俄間意識形態的對立、思想路線的鬥爭，決沒有緩和。那麼，所謂「國家關係」又如何呢？

在賀電中，毛共一則曰：「中國一向認爲，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該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再則曰：「從這一原則出發，採取切實措施，解決兩國關係中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使我們兩國關係成爲友好睦鄰的關係」。這些話清楚地顯示，毛共仍然堅持「原則分歧」，匪俄的「國家關係」並不「正常」，很多「重要問題」「懸而未決」，還稱不上「友好睦鄰」。

如果把這些詞句，拿來和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毛共爲副部長級談判所發表的聲明中的詞句相比，那幾乎沒有多大分別。這是說，匪俄經過了整整一年有奇的談判，兜圈子作馬拉松賽跑，又須要回到原來的起點再度出發。

然而，蘇俄新任「大使」托爾斯蒂柯夫（V. S. Tolstikov），已於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抵達北平任所，毛共的新任「大使」劉新權，也已於十一月廿二日赴俄履新，中斷了四個年頭的「大使」級關係業已恢復。同樣是一月廿二日，匪俄間還簽訂了總額不到一億美元的貿易協定，那也是三年來的首次。

那麼，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匪俄間的原則性鬥爭將無限期的持續，而「國家關係」則已有限的緩和。但就共黨立場言，無疑是更注重前者。在「原則」方面決不能退讓，「國家關係」也就永難徹底改善。此處所謂緩和，只能是指正面的衝突被暫時延緩而已。

### 三 正面緩和衝突，側面加強鬥爭

共黨的鬥爭從來不像美國西部影片中的牛仔，要面對面拔鎗。史達林說

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註一三）。這是「從裏面鑽出來」的戰術。然而，目前匪俄雙方都沒有從對方內部顛覆對方的能力。共黨的另一戰術是側背迂迴，往昔列寧要經由東方再到西方，而今，匪俄雙方也在正面緩和衝突，側面加強鬥爭。清楚一點兒說，匪俄鬥爭的重點，是放在外交戰方面。

自由世界正在高唱「談判時代」。不僅偽裝「和平」的蘇俄，甚至崇尚「暴力」的毛共，都想加以利用。這正是目前毛共加強外交攻勢的促成因素之一。但共黨從不把目的和手段混同，毛共認為「用革命的兩手策略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以談判對付談判」，都是「針鋒相對」的鬥爭之一（註一四）。

共黨最嫻熟量變質變的策略運用。蘇俄解釋「和平共處原則和階級鬥爭」時說：「爲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勝利，是不須要戰爭的」。「假如資本主義正在逐年喪失自己的陣地，那麼，世界社會主義則正逐年發展壯大起來，今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決定着世界發展的方向，而是社會主義決定着發展的方向，今天是社會主義正使資本主義接受自己的條件」（註一五）。這自然只是它的願望，但也是它鬥爭目標所指的方向。

今天，毛共也正設法在國際間侵蝕對方的「陣地」，使自己的影響力獲得「發展」，逐漸「量變」，爲將來的「質變」創造條件。不過，它的目標是一石多鳥。不斷抨擊美帝和社帝「兩個超級大國互相勾結、互相爭奪、妄圖瓜分世界」（註一六）。指責日本想和美帝、蘇修並肩成爲第三個超級大國（註一七）。一方面又日夜叫囂反超級大國，反對「世界慕尼黑」，號召其追隨者把反對帝、修、反的鬥爭進行到底。當然，蘇俄也不斷反擊。茲略舉雙方在各方面的鬥爭事實如左：

## （一）共產集團

過去，毛共抨擊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把其他若干共產國家也視爲蘇俄的同黨，凡在思想意識或赤化策略方面不肯同調毛共的，毛共都對之採取敵對立場。以致文革期間，除親毛的阿爾巴尼亞，及中立的羅馬尼亞和北越外，與其他共產國家的關係普遍惡化。這無疑會給蘇俄一個良好的機會，使它在對匪鬥爭中佔有優勢。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侵捷，使毛共頗感震驚。乃加緊勾結阿爾巴尼亞，拉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蓄意培植一個對蘇俄懷有敵意的巴爾幹，在西面牽制蘇俄；一九六九年七月與北韓改善關係，一九七〇年春，在亞洲組織反美反日的赤色統一戰線，藉圖把北韓、北越團結在自己周圍，使蘇俄相形陷於孤立。

此外，毛共對其他共產國家普遍簽訂貿易協定，并陸續恢復派遣「大使」，增進外交關係。如依照時間先後排列，毛共現已派出的駐共產國家「大使」如左：

駐阿爾巴尼亞——耿飜（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北越——王幼平（六月五日）；羅馬尼亞——張海峯（六月十七日）；北韓——李雲川（一九七〇年三月廿三日）；南斯拉夫——曾濤（八月十五日）；匈牙利——呂志先（八月十五日）；波蘭——姚廣（八月廿三日）；東德——宋之光（九月廿日）；蘇俄——劉新權（十一月廿三日）；古巴——張德羣（十二月五日）。本文執筆時，只有對保加利亞、僞蒙和捷克，毛共都還沒有派出「大使」。湊巧這三者都是最親俄的。不過，保駐平新任「大使」留賓·斯托揚諾夫，已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到達任所，毛共也終將派出它的「大使」哪。

毛共曾以物資救濟羅、匈的水災。對北韓、北越有經技乃至軍事援助，對阿、羅有長期無息貸款。北韓、北越、阿、羅的各種代表團，不斷訪問毛共。它們彼此之間，也互相訪問并連環簽約。這些，表面上都對匪有利，使蘇俄受到冷落。

蘇俄對東歐的控制，也在步步加緊。一九七〇年七月「經互會」內成立「國際投資銀行」（羅未參加），使「經濟一體化」獲得進展。同年一月廿四日華沙公約聯軍參謀總長蘇俄上級大將斯普敏科（S.M. Shtemenko）在「紅星報」爲文透露，華沙公約已有常設聯軍。五月六日俄捷簽訂友好新約，將「布里茲涅夫主義」（即有限主權論）納入其中。

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俄羅續簽友好新約，羅拒絕「布里茲涅夫主義」而保持其獨立自主立場，蘇俄亦曲予遷就，以求巴爾幹之暫時安定。十一月廿七日，即阿爾巴尼亞解放廿六週年之前夕，蘇俄「消息報」對阿故示友好，聲言蘇共和政府「正儘可能消除莫斯科和地拉那之間的歧見」，準備用談判方

式解決雙方糾紛，促使關係正常化，「以利社會主義社會及一切反帝勢力之加強」。但如前所述，阿共在紀念行事中的每一場合，都指名攻擊蘇修帝國主義，似乎是對毛共作「交心」表示。

目前，阿爾巴尼亞是毛共「三反」的忠實伙伴，在二者交往中，不時強調要把帝、修、反埋葬。羅馬尼亞不願接受「布里茲涅夫主義」，但并未公開反俄，與俄仍有合作關係。毛共也只能對它講：「中國人民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都將堅決支持你們維護民族獨立、獨立自主地建設自己的國家、反對外來干涉的正義鬥爭」（註一八）一類的話，不能直接抨擊蘇修。

南斯拉夫同樣和蘇俄保持相當關係，但也和羅馬尼亞一樣感受蘇俄的威脅，因而與毛共勾搭。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南駐平「大使」博格丹·奧列什查寧舉行招待會，慶祝南國慶。席間他致詞說，南斯拉夫支持各民族自由、平等、各國主權平等的政策，主張所有國家，不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是發達的國家還是發展中的國家，不分行社會制度有何不同或是有其它可能的分歧，都應享有平等的主權。南斯拉夫遵循不結盟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和各種形式的霸權」（註一九）。

目前，毛共一方面藉「和平共處」的笑臉發動外交攻勢，一方面叫囂「弱國能够打败強國，小國能够打败大國」（註二〇），鼓動所謂反帝鬥爭。毛共對於不結盟的態度，也與前此大不相同。依此看來，毛共在國際統戰方面和南共的「共同點」，似乎尤多於羅共。因此，出席南「大使」招待會的僞「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就當場聲言國家與國家之間應遵守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并且說：「這些原則應該適用於一切國家，而不管它們的社會制度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註二一）。

對於右述論調，蘇俄曾予以抨擊（詳後）。但在目前，巴爾幹仍然是蘇俄的隱憂，至於其他東歐國家，即使與毛共關係「正常化」，也不致動搖蘇俄的控制，如果沒有其他重大變故在國際間發生的話。

僞蒙是百分之百親俄的。北越與北韓都離不開毛共的軍經支持，但也需要蘇俄的援助。在北越，現代化武器依靠俄援，傳統性武器多來自毛共；建設器材仰賴蘇俄，日用品多為毛共供應。北越不能開罪任何一方。在北韓，反美反日須要毛共串通一氣，毛共對它也給予軍經援助，但大規模的建設資金和

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仍然要靠蘇俄。一九七〇年六月廿五日韓戰二十週年紀念時，毛共利用機會聯合東南亞與東北亞共黨，大唱反美反日。八月十五日北韓「解放」廿五週年，毛共未派代表亦未有賀電。蘇俄則派第一副總理馬祖洛夫率高級代表團赴平壤，在紀念大會中重彈「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舊調（北韓通訊社報導刪去此點）。北韓的七年計劃執行不力，延長三年至一九七〇年結束。同年十一月二日北韓共黨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為避免匪俄在會中衝突，索性不邀請外國共黨參加。金日成所作的「中央委員會工作總結報告」，在第四節「為了加強同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中，強調「黨的自主的、原則性的對外政策，得到世界許多兄弟黨、國家和世界許多革命組織和人民的 support」。把反修正主義鬥爭放在第五節「為了加強黨的工作」內（註二二）。換言之，那是黨內反修而不是黨外反蘇。大會通過了從一九七一年起的六年計劃，仍然須要向匪俄兩面要錢。

毛共藉反侵略、反美國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口號，組成了亞洲赤色統一戰線，使得蘇俄處境尷尬。過分積極等於支持毛共，反應消極將使自己在「反帝」方面失掉立場。十二月五日蘇俄在華語廣播中，一方面支持北越和越共所提「和平的政治解決越南問題」的建議；一方面鼓吹華沙公約東柏林會議的聲明中所說，社會主義國家要本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對印度支那人民擊潰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給予全面支援；同時，却譴責「北京暫且還採取從前的分裂的策略，這自然使反帝鬥爭的共同事務受到損失」。這些充分反映出蘇俄內心的苦悶。

至於古巴，它也在和毛共改善關係。但它不會忘記蘇俄艦艇出入加勒比海對它的好處，更不會忽視平均每天一百萬美元的蘇俄援助。

## (2) 西方

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唱出「中間地帶論」。以亞、非、拉丁美洲為第一中間地帶，以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二中間地帶。同年七月十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把日本也列入「第二」之內。一九六五年時，毛共最初慫恿最後杯葛的第二次亞非會議流產，毛共在第一中間地帶遭到失敗。在第二中間地帶，法國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七日與毛共建交，此後很久不曾有效尤者出現。直到一九七〇年十月

十三日加拿大才為毛共的統戰外交作了開路先鋒。

目前，毛共恢復了在中間地帶的活動，却不再重複中間地帶的唱腔。

毛共認為：「第二個中間地帶的國家有兩重性，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既剝削和壓迫別人，同時又受到美國的控制、干涉和欺負」。因為「它們力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在這一方面，它們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人民有共同點」（註二三）。在這個反美的「共同點」上，它們被認為毛共的同路人，也就成為毛共統戰的對象。

加拿大和毛共建交後，「人民日報」於十月十五日發表社論「歡迎中加建交」，文中特別強調：「加拿大是美洲的一個大國。加拿大政府今年五月發表的對外政策白皮書，反映了加拿大政府要求執行獨立方針的思想和意志」。這清楚地是在煽動反美情緒。

在同一篇社論中，毛共鼓吹它和加拿大建交，使得它的「國際威望越來越高，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越來越大」。而阿共的「團結報」更為毛共大事捧場，認為這是毛共「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和威望全面增強的又一證明」。甚至高呼：「今天沒有毛共，任何重大的國際問題都不能解決」（註二四）。

這樣的吹捧，委實過火得肉麻。但國際間的鬥爭雙方，有如天秤的兩端。第二中間地帶承認毛共的國家增多，無疑會助長毛共的氣焰。且毛共的影響力若果加大，則鬥爭的對方的影響力就相形減小了。對方是誰？是美國，是蘇俄，還有日本等等。

毛共在「歡迎中加建交」一文中聲言：「在今天，一兩個『超級大國』企圖控制國內外政策的作法，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日本「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出版的「人民新聞」評論說：「毛共建交」是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的沉重打擊」（註二五）。「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總部就此項建交事發表聲明稱：「這是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沉重打擊」（註二六）。匪義建交（十一月六日）後，「人民日報」社論「歡迎中義建交」中，指責美國對它採取「不承認主義」，「孤立」和「遏制」毛共。而後又悍然宣稱：「二十一年已經過去了，真正被孤立的究竟是誰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敵視中國人民的美帝國主義」（註二七）。這篇社論也抨擊「日本反動派佐藤榮作之流」。雖然不曾明白指出，但被目為「超級大國」之一的蘇俄，自然也在毛共「孤立」的對象之列。

蘇俄深切瞭解毛共的用意何在。它在「新時代」雜誌上，譏諷北約國家為了貿易上的蠅頭小利而與毛共建交。它一方面指責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已滲入毛共的經濟；一方面警告說，如果比利時或任何一個北約國家再與毛共建交，則半數以上的北約成員國，將成為毛共「正式的外交伴侶」（註二八）。十二月八日蘇俄利用華語廣播節目露骨地抨擊美國利用加義與毛共勾搭。它歷數尼克森採取的許多措施，都在實現所謂對毛共關係小規模正常化的計劃。它說美國現在得到了設在北平比法國大使館和英國代辦處更為可靠的觀察哨，而華盛頓近旁有毛共的官方代表，美國和北平勾搭就更為方便。

蘇俄的抨擊不可盡信，但那充分反映了蘇俄對西方國家與毛共建交的不滿。

蘇俄知道，有了毛共參加，不僅任何重大的國際問題，都將更「不能解決」，而蘇俄的聲望與影響力，也將隨同美國更遭受打擊。因此，它未必真心歡迎毛共進入聯合國。至於蘇俄駐聯合國代表趕在聯大表決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之前，作沒有事先登記的發言而替匪幫腔，恐怕只能解釋作慌張的順水人情。

### （3）亞、非、拉丁美洲

毛共與赤道幾內亞（十月十五日）及衣索比亞（十一月廿四日）建交公報，和毛共與加義的建交公報不同。前者都有毛共支持該兩國「政府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字樣，顯示毛共對第一中間地帶運用的特點。但毛共在此一地區（日本被毛共視為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是美國政策的亞洲代理人，現今不屬所謂中間地帶），也并非一付面孔。在中南半島與中東支持武裝叛亂，對反共國家進行恫嚇、謾罵與顛覆。對另外一些國家實施笑臉攻勢和支票外交。據統計，經毛澤東本人接見的外國使節、代表已近三十次。十一月間，巴基斯坦總統亞雅汗往訪時，毛共報導中把毛澤東「接」見改成了「會」見。此外，除了周恩來直接處理外交事務外，又使主管財政經濟的李先念參加，而偽「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化民，及偽「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的訪問亞非國家，無疑都與銀彈攻勢有關。

有若干亞非國家現正接受匪援。其中最大的兩筆，應推對坦尚鐵路的四億美元貸款，以及十一月間給予巴基斯坦的二億美元（註二九）無息貸款。這些援助實際也是毛共「三反」策略之一。

尚比亞已宣布歐洲人投資的銅礦公司，須以五一%股份讓與政府（在未來分紅中分期償還），外資開採的銅礦，礦權收歸國有。現今電台、「友好書店」、毛語錄等等，都已隨同毛共技術人員及工人進入坦桑尼亞。坦國軍隊向由蘇俄及加拿大給予援助及指導，一九七〇年起已由毛共一手包辦，警察學校也由毛共代為建設。新的軍港在建設中，坦國空軍也使用毛製米格機訓練。至於毛共援助巴基斯坦，則與對美、俄、印鬥爭有關。毛共不作賠本生意，它犧牲大陸人民生活以援外，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在。

蘇俄在地中海以及印度洋伸展勢力，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口號，一則企圖填補英美撤退後的權力真空，再則也含有圍堵毛共的意義。蘇俄與星、馬增加貿易，與印尼緩和關係，以貿易誘惑菲律賓，以開發西伯利亞引誘日本，它和伊朗已締結重要通商協定，與阿聯、敘利亞、葉門、南葉門以及其他中東國家保有密切關係。以武器供應索馬利亞與烏干達，對其他與毛共有關的亞非國家也進行爭取。巴基斯坦本是蘇俄的援助對象之一。在拉丁美洲，蘇俄就大佔上風了。而中南半島的共黨以及中東的巴游，蘇俄當然不會留給毛共去獨自發揮影響力。

#### 四 結語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香港「大公報」「縱橫談」的標題為「時代變了，它們不變也得變」。其中有幾段是這樣說的：「在聯合國會議中，有許多國家強烈譴責超級大國壟斷國際事務，爭奪世界霸權，劃分勢力範圍，把聯合國作為他們推行強權政治的工具」。「最值得注意的，則是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正在紛紛起來，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它們的目標是：（一）爭取民族平等，（二）維護國家主權，（三）反對霸權主義，（四）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控制和宰割」。現今，毛共就以「和平共處」（毛共最近與外國建交公報中，都有「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姿態，爭取第二中間地帶的大國，以削弱超級大國的陣地；籠絡第一中間地帶的中、小國家，以增強自

己的同盟軍。

顯然，毛共籠絡中、小國家時，是利用「大公報」所述的四種目標作掩護，在這方面它和不結盟的南斯拉夫有其「共同點」。因此，在前述南「大使」奧列什查寧和喬冠華的談話發表後，蘇俄在十二月二日華語廣播中以「和平共處原則和階級鬥爭」為題，予以公開抨擊。

談話說蘇共執行的是列寧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原則。又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依然是當前時代的基本矛盾，一分一秒也不能忘記同世界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在國際舞台上，不是直接在階級間，而是通過在有階級性的國家來進行這場鬥爭。談話認為，說世界上只存在貧國與富國、小國與大國之間的矛盾，是臭名昭著的論調，是給帝國主義者幫忙。因為，對待國際關係，一旦採取這種態度，那麼階級鬥爭的概念就被取消了。談話譴責毛共把蘇俄稱為社會帝國主義，說蘇俄想同美國一起控制全世界。毛共的一些活動家，在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代表談話時，宣稱毛共準備同任何國家改善關係，不管它的制度如何，只要這個國家疏遠美蘇兩國就行。這些，都是匪俄間「針鋒相對」的鬥爭。

綜上所述，似可作出如下的結論：匪俄間的原則鬥爭無可妥協，但當前的鬥爭是，由軍事移向政治，由戰場移向會場，由正面移向側面，由自己伸拳移向唆使旁人動手。它們都在利用自由世界所謂談判時代、多元外交的空氣，進行孤立對方，聯多打少的把戲。它們目前并未在統一戰線下團結一致，但在彼此鬥爭的同時，絕不忘記向「階級敵人」進攻，而且是向着共同目標分頭前進。就目前的外交戰形勢而言，或許是毛共略佔上風，但深窺量變質變而實力又遠超乎毛共之上的蘇俄，又豈肯長期縮手？！

註一：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載：「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中指出由於毛共代表團的堅持，就把此語補充進一九五七年國際共黨莫斯科會議「宣言」裏。註二：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的「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三一—八頁。註三：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發表的「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四六—九頁。註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朝日新聞」晚刊載該報長井特派員莫斯科六日電訊。註五：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註六：

有令人滿意的發展，而且由於東德對於西柏林交通之無端干擾，使得此一問題更加複雜與尖銳化。本來布朗德政府的東向政策與妥協態度，應該最易獲得蘇聯集團之贊許的，因此不應有無端生非之事，因此延遲德俄條約之批准，但是由近日蘇聯集團對柏林問題之強硬態度看來，布朗德政府之東向政策可謂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其影響歐洲和緩之獲致實大。何以蘇聯集團有此曖昧的改變呢？吾人以爲，蘇聯或以布朗德聯合政府隨時有垮台之慮，因此德俄條約獲得西德國會批准之可能性，實在值得懷疑，於是蘇聯以爲與其支持布朗德從事此一沒有把握的冒險，倒不若稍待時日，以俟一穩固之多數黨的政府出而執政時再爲討價還價爲宜，因此對於柏林問題遂不願輕易讓步，但是正因爲柏林問題未獲解決，因此歐洲安全會議之舉行，必將遙遙無期。

柏林問題實在是在歐洲緩和局勢關鍵之所在，柏林這一神經中樞地區之緊張情勢，如果繼續存在，則奢談歐洲安全似乎不切實際，更何況西方國家明白的以柏林問題之獲得解決，做爲歐洲安全會議召開之先決條件呢！因此吾人可以說，柏林問題與歐洲安全會議交織成爲一件事物的兩面，相互牽制無法分離。柏林問題激結之所在，在於在東西方觀點之互異，蘇聯以西柏林爲一獨立之政治特區，與波昂政府毫無關係，東德以爲西柏林既在東德境內，則應爲其領土之一部分，西德則以西柏林一直爲其所管轄，在法律與政治上均屬於其管轄權範圍內之事，更何況絕大多數的西柏林市民，皆願意與西德保持現有之政治聯繫，認爲西德之有權統轄西柏林，正如東德之統轄東柏林一般，因此西柏林與西德間應開放更多之交通旅行路線，西柏林市民應有權握有西德護照，來往於西德與西柏林之間，而免辦簽證手續，這些是西德與西方一致的主張，但是此種主張爲東德與蘇聯所否認，認爲此種主張係破壞柏林的政治獨立地位，所以它們對於西柏林之陸上交通經常隨時加以阻撓，因此之故，在二十五年間以來，柏林危機屢現，而最近東德對西柏林交通之阻撓，也使得初露「緩和」曙光的歐洲局勢又蒙上陰影，對於布朗德之東向政策自然予以致命的打擊，因此更不論歐洲安全會議了，所以蘇聯集團如果真正有意於歐洲之緩和與安全之前途，似乎唯有放棄其以柏林做爲施用壓力之政策方能達成。

除了柏林問題之外，東西方軍力之裁減也是促成歐洲緩和之重要步驟之一，西方以爲若不裁減駐紮於歐洲之軍力，則倡議歐洲安全似乎徒託空言，而尋求和平與安全之誠意也就值得懷疑了。試觀蘇聯在大力倡導安全會議之際，在高喊東西緩和之時，其軍力之擴張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核子武力而言，已幾與美國相等，而反飛彈火箭方面尤較美國爲優先，其地面部隊

更超越了西方軍力，海軍艦隊更在各大洋中頻頻出現，但在此時，蘇聯却喊出了「緩和」的口號，其爲笑裏藏刀，目標在鬆懈與瓦解西方之防衛意志力量，可謂昭然若揭。由於西方國家洞悉蘇聯集團之意圖，因此北約組織此次在布魯塞爾的會議中，決定以十億美元加強軍事防禦力量，而駐紮於西歐的二十八萬美軍，也決定在一九七二年前不撤出，吾人相信，如果西方欲真正獲得所謂歐洲安全之果實，則必須以實力爲後盾，這樣才能迫使蘇聯就範，而歐洲安全會議之召開也才有希望。

#### 上接第30頁

該項公報由「新華社」於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發表。註七：見最近莫斯科華語廣播，文多不及備舉。註八：即批判蘇俄「有限主權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侵略有理論」、「國際專政論」、「共產主義基督教論」、「安全責任論」、「利益有關論」、「經濟一體化論」等十個論點。註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新華社」北平電。註一〇：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九日「新華社」北平電。註一一：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九日「新華社」地拉那電。註一二：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兩報一刊」紀念列寧文章：「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然此說非自此文始。註一三：轉引出處同註一二。原註：「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七一頁。註一四：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註一五：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和平共處原則和階級鬥爭」。註一六：毛、林、周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八日爲阿爾巴尼亞解放廿六週年，致阿共第一書記霍查、阿人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列希、總理謝胡的賀電。惟此種論調在其他場合亦屢見不鮮。註一七：一九七〇年十月廿五日「新華社」署名「一記者」的文章。註一八：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五日李先念在羅駐平「大使」杜馬爲由羅副主席奧爾基·勒杜列斯庫率領的羅政府代表團舉行的宴會上講。註一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新華社」北平電。註二〇：一九七〇年五月廿日毛澤東發表的反美聲明。註二一：同註一九。註二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報」第三版。註二三：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社論。註二四：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新華社」地拉那電。註二五：一九七〇年十月廿四日「新華社」報導東京消息。註二六：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註二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三、廿四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會連續摘要發表其內容。又按，北約十五個會員國中，現已有英、法、荷、挪、丹、加、義七個國家承認毛共。註二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路透社達卡電所報導，亞雅汗在記者招待會中透露之數字。按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七〇年六月第三次開發計劃中，曾獲匯撥四千萬美元，後又有增加。本次爲毛共對巴第四次開發計劃之援助。